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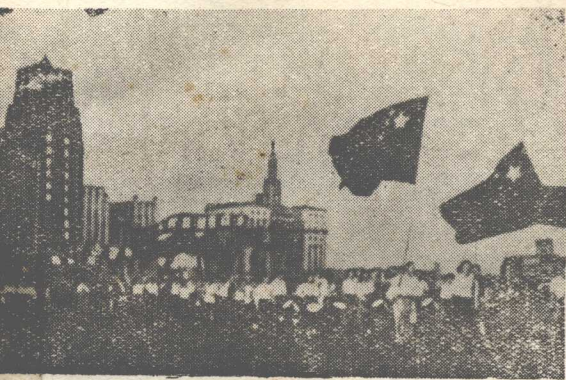
上海青运史

共青团上海市委青运史研究室主编

86'3

资

料



● 本期要目

-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非基督教运动
- 上海地下学生运动斗争策略的回顾和体会
- 回忆南下服务团·莘庄事件的善后工作
- 李林在上海爱国女中
- 艰苦奋斗中的全国学联

封面设计
责任编辑

王申生
柳 定 林晓军

上海青运史资料

编辑：《上海青运史资料》编辑部

出版：共青团上海市委青运史研究室

（地址：上海漕溪北路6号）

印刷：《民主与法制》印刷厂

(70) 王琳吴.....

(17) 定海丰.....

(77) 张京新.....

上海青运史资料

(08) 戴教林斗昌 张林.....一九八六年

目 录

第三辑

(总第1辑)

1986.9出版

专题研究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非基督教运动

.....刘心勇 (1)

上海地下学生运动斗争策略的回顾和体会

.....李琦涛 (9)

南下专题

回忆南下服务团.....伍洪祥 (25)

目击莘庄事件.....商铮等 (32)

莘庄遇炸.....李桂成 (36)

抢救伤.....杨宏燕 (39)

莘庄事.....张传栋 (41)

翻越白与山.....孙龙英 (44)

青年英烈

李林在上海爱国女中.....舒志超 (51)

青运史话

六·二三反内战游行前的一场斗争.....王一明 (60)

- 狱中七十天.....吴根星 (67)
- 拒交第二次学费的斗争.....李祥宝 (74)
- 在斗争中争取入党.....杨东海 (77)

学运史料

- 艰苦奋斗中的全国学联.....孙萍 马长林选编 (80)

革命者诗抄

- 新中国颂歌.....周思义 (94)

封面图片说明:

(上)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图为上海青年隆重集会游行,庆祝胜利。

(下)上海青年积极响应市学联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南下随军服务团,图为南下动员大会的盛况。

- (25) 林兆恩.....
- (32) 李祥宝.....
- (38) 杨东海.....
- (39) 燕宝耐.....
- (41) 林祥源.....
- (44) 吴根星.....

- (12) 孙萍.....

- (00) 周思义.....

第一次国内革命

战争时期的非基督教运动

刘心勇

从十九世纪中叶到本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对我国政治、经济侵略的深入，基督教会势力得到飞速发展。据一九二三年中国基督教会年鉴报告，“基督教在全国一千七百十三县中，没有占据的只有一百二十六县，其余都树立了基督教的旗帜。”①二十年代初，基督教（包括新旧教）在中国的信徒总数达到二百多万。教会在中国所办的学校更是取得惊人的发展。到一九二四年，教会学校的学生在新教学校中约三十万，在天主教学校中约二十六万，总数达五十六万人。②

基督教会在旧中国的发展，构成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势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教会教育的蔓延，更成为帝国主义宣扬殖民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反对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基督教会及教会教育，揭露隐藏于基督教背后的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实质，是当时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必然的、逻辑的发展。

一九二二年初，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决定于四月四日至八日在中国召开第十一届大会，以进一步扩大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同时决定借清华大学为会所。消息传出，首先引起青年学生们的激烈反对。三月九日，在组建不久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下，上海部分进步学生联合发出“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称“基督教及其基督教会是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先锋队”，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是资本主义的走狗”，③反对此次会议在中国召开。三月十五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

《先驱》发出一期“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号”。此专号除全文登载“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及其“章程”以外，还发表了陈独秀等人的文章，抨击基督教会是帝国主义政府殖民政策的“导引”，是帝国主义压迫远东民族的帮凶。

与非基学生同盟宣言发表相隔七日，北京《晨报》又有非宗教大同盟的来电和宣言，抨击基督教违背科学，束缚思想，麻醉青年，来电有李大钊、李石曾、范鸣劫、刘仁静、何孟雄、金家凤等七十七人的签名。四月四日，即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开幕的当天，李大钊、邓中夏等十二人在《晨报》又发表“非宗教者宣言”。四月九日，非宗教大同盟在北京召开了反宗教大会。此后，全国各地教育界人士和青年学生纷纷发出通电、通函，积极响应上海北京发起的非基督教运动，致使教会人士惶然惊呼：“知识阶级……遂无老无少，群起而反对（基督教）。宣言通电，雪片纷飞”④。

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全国各地的非基运动从未中断。上海、北京、广东、湖南、江苏、浙江等地不时出现非基同盟组织，进行反对基督教的宣传和鼓动。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中心组织，所以往往不能持久。在其宣传鼓动上，也仅限于口号式的抨击，既没有出现一个较有影响的杂志刊物，对基督教进行持续不断的深入批判，也缺少对教会及其在中国兴办的事业进行历史的、系统的研究。由于这些原因，这两年中，非基运动一直停留在较低水平上徘徊不前。

从一九二四年起，非基运动转入高潮阶段。其标志是上海非基督教大同盟的重新建立。

一九二四年八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决定恢复上海非基督教大同盟。同时，通告各地，要求各地团组织重新恢复非基同盟，进一步发展非基运动。在团中央局的直接领导下，

上海非基督教大同盟于八月底首先重建，重建的上海非基大同盟宣布其宗旨是：“秉爱国之热情，具科学的精神，以积极的手段，反对基督教及其所办的一切事业。”^⑤同时，非基大同盟成立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委员会，五人委员会成员包括了著名共产党员唐公宪、张秋人、柯柏年等人。

上海非基大同盟重建之后，立即展开积极的宣传活动，对基督教传行中国的历史和教会兴办的各种事业进行调查研究，努力于深刻揭露其内在的本质。非基大同盟吸取了以前非基团体的经验教训，不但建立了强有力的组织，同时还创办了《非基督教特刊》，不断报道各地非基运动的发展情况，并刊登大量文章从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对在华的基督教会势力进行抨击。除《特刊》外，创办不久的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也不断地发表文章，进一步指导和联络各地的非基运动。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中国青年》编辑部和上海非基大同盟合编出版了《反对基督教运动》一书，此书发行后，销售量达到4万册，在青年学生中激起巨大反响。

由于上海非基大同盟的积极活动，加之其时全国人民反帝情绪不断高涨，非基运动出现了新高潮。上海、南京等全国十七个城市先后出现了非基同盟，甚至远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组织了非基团体。这些非基团体广泛地发行刊物，组织演讲、游行、散发传单。成千上万青年学生都热烈地投入了这一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各地非基团体的活动，以一九二四年底开展的“非基督教周”最为出色。十二月十六日，上海的《特刊》发表社评，建议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圣诞节前后一星期为“基督教周”，号召各地青年在此期间发动大规模的反教活动。在上海非基大同盟的推动下，“非基督教周”活动波及全国各重要城

市。青年学生们举行通俗演讲，散发传单。有的地方，教会牧师在一些“游人荟萃之所”布道传教，他们就去同一地方进行反基督教宣传，与传教士“短兵相接”，甚至对垒三四天。教会虽有洋鼓洋号画片等诱人，但是“牧师们的鬼话，当然比不上非基同盟热烈诚恳的演词”。⑥在广州，反教活动得到了革命政府的支持。十二月二十五日，广州非基大同盟邀请廖仲恺等人演讲。二十九日，又请周恩来同志演讲，题目是“基督教与帝国主义”，他的演讲“辞表俱佳，听众非常踊跃”。⑦当时，不仅主要城市，连西北的延安等边远城市和内地的城镇也同样受到非基浪潮的冲击。从一九二四年开始，为抗议教会学校当局干涉学生参加爱国运动和殴辱学生，全国各地的教会学校不断发生罢课和退学事件。五卅惨案后，教会学校学生的退学风潮达到了顶点，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九二五年六月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退学事件。五卅惨案发生后，约大学生和全市群众一道，积极参加“三罢”斗争。该校校长、美国人卜芳济对学生参加爱国运动横加干涉，六月三日，卜芳济强行撕毁学生们悬挂的中国国旗，并诽谤学生“是本校误养的一股强盗。”⑧卜之行径，激怒了圣约翰的广大中国师生。当天，全体学生议决一致退学，誓不再来，全体中国教员亦同时辞职。退学师生临组光华大学，致使约大停办达两年之久。退学风潮的发展，使帝国主义在中国经营几十年的教会学校门庭骤然冷落。据统计，基督教会中学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三二年的发展情况如下：

年度	学校数	年度	学校数
1915	116	1927	100
1919	165	1928	172
1924	339	1932	196⑨

从上表亦可见退学风潮的结果。只是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

叛变革命以后，教会教育的发展势头才得以恢复。”⑨

一九二五年以后，各地非基团体开始在实际行动中注意了统一战线问题。

连续几年的非基运动，使“基督教”三个字在一般青年学生心目中，成为使人反感的词汇，几乎一提起基督教就使人联想到帝国主义对华侵略。但由于理论上没有注意将一般教徒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教会相区别，所以，运动中有全盘否定基督教及一般教徒的倾向。有些地方的非基团体任意鼓动教会学校的学生退学，有些地方的学联拒绝教会学校的学生加入学联或任何学联组织的活动。在反基运动中，也不善于区别宗教徒正常的宗教生活和帝国主义分子的反动行为。一九二五年一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三大”通过的“反基督教运动决议案”中，青年团中央就为纠正这一错误倾向作了努力。决议案指出：“本团同志切不可因反对基督教而憎恶一般教民与教会学生，应该指出他们受传教士与牧师的压迫与欺骗。本团也不一定要引导已觉悟的教民与教会学生脱离基督教的势力，应该引导他们在基督教势力之下的群众中，努力作反基督教的运动。”⑩接着，广州的非基大同盟发表“为反基督教告全国同胞”一文，提出了求“反帝”之同，存“信仰”之异的指导思想。北伐战争开始后，在党的引导下，广东、湖南、江西等省的非基团体大多抛弃了过去的左倾态度，注意运用统一战线思想，提出“教会学生是反文化侵略的先锋队，”“欢迎教徒和教会学生加入革命战线”、“援助教会学生在校内的自由争斗”⑪等口号。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湖北反基督教同盟召开大会，会上报告者明确提出：“反基督教的根本观念就是反帝国主义，”“反基督教不是反基督徒。”大会决议：号召“全中国的基督教堂、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徒一齐独立起来，离开一切外国神父牧

师的统治^⑫”。党的统战政策在非基运动中的贯彻,有力地团结和教育了基督教徒,尤其是教会学校的学生,大大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激情,他们纷纷加入反帝爱国的光荣行列,终于使非基运动“不是站在教会大门以外乱喊,而进步到深入教堂和教会学校内部,拉着教徒和教会学生一同战斗的时代了。”^⑬

在非基督教运动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及其助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改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下,第一次从理论上对帝国主义在华的基督教会展开了全面的揭露和批判。主要内容大致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批判了基督教的反科学性和伪善性。上海非基大同盟在其成立宣言中指出: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一样是“麻醉一切被压迫被掠夺民族和人民的毒药。”^⑭蔡和森在“近代的基督教”一文中指出,工人们“祈祷上帝是不能得面包的”,而基督教只是资产阶级利用来“消磨工人阶级革命精神的利器。”^⑮在非基运动中中国人民开始认识到:必须“站在科学的观点上,不断除世界文明的障碍,对于一切骗人的宗教,尤其是最具魔力的基督教是毫不客气的给他一个最根本的致命伤。”^⑯

第二,深刻揭露了基督教会与帝国主义侵华势力的内在关系。梅电龙在《基督教与中国》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的发展,同时也就是基督教势力的发展,而教案之发生,又是帝国主义利用以发展势力的好题目。双方步骤,一致不乱。”^⑰柯柏年在《特刊》发表“远东弱小民族与基督教”一文,进一步分析了基督教会与国际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之间的关系,指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代表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非基督教运动使中国人民认识到:基督教会所宣扬的“人格救国”、“上帝基督”等观点,是为了要让中国人民相信,一切都是上帝所命。所以,帝国主义“要我们怎样,我们就怎样,霸占了土

地，索性送给他；干涉了政治，索性就请他来做皇帝”^⑮，总之，是为了消灭中国人民的团结和反抗精神。^⑯

第三，批判了教会学校对中国学生的奴化教育。教会教育，是非基运动的一个重要冲击目标。恽代英同志当时著文号召“打倒教会教育。”他说，“有一百万民众，二十余万青年正在美帝国主义派遣来的一般牧师、神父、教会教育家手中，受他们的蛊惑劫制。我们天天怕色彩，怕党派；然而帝国主义已经借教堂、学校和青年会的帮助，在中国造成这样一个大的党派了。我们愿意永远一盘散沙地屈服于他们这样党派行动之下么？还是我们应当为反对他们而即刻组织起来？”^⑰《特刊》也发表了大量文章，猛烈抨击教会教育：“我们之所以反对教会学校，并不是因为学校是洋人办的，脑际存在种族的仇恨，而是在它偏重于外国语的练习，不注意于科学的研究，宣传空想的国际主义，消灭国民之爱国心，萎靡青年的独立精神。”^⑱他们把中国青年引进他们的学校，只许服从不许反抗，叫他们天天做祷告，读圣经，唱赞美诗，预备很顺从地做帝国主义者奴隶。”^⑲教会“教育的目的全在传教与麻木人们的思想，使人洋奴化。”^⑳二十年代初，教会学校往往以其设备齐全，师资优秀等条件赢得一般知识分子赞赏，普通学生对其仰慕者也不乏其人，所以，非基运动对教会教育目的的实质进行抨击，在当时，也有震聋发聩之作用。

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非基督教运动，是一场反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爱国运动，它直接促进了二十年代的“收回教育权运动，”推动了基督教界要求“自立、自养、自传”的中国教徒自立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在教会中的势力。

①转引自《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61页。

- ②转引自陈元晖《中国现代教育史》，81页。
- ③《先驱》第四号
- ④《批判非基督教言论汇刊全编》，1页。
- ⑤《非基督教特刊》第一期
- ⑥同上，第二十二期。
- ⑦同上，第二十一期。
- ⑧《热血日报》第四期
- ⑨转引自陈元晖《中国现代教育史》，145页。
- ⑩《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二册，59页。
- ⑪转引自沈以藩、曹圣洁《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见《社会科学》1982.3
- ⑫⑬《中国青年》第一五一期
- ⑭《非基督教特刊》第一期
- ⑮《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一册，537页。
- ⑯同上，第三册283—284页。
- ⑰同上，第一册，530页。
- ⑱《非基督教特刊》第九期
- ⑲《中国青年》第六十期
- ⑳《非基督教特刊》第八期
- ㉑《中国青年》第二十四期
- ㉒《非基督教特刊》第九期

上海地下学生

运动斗争策略的回顾和体会

李琦涛

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学生运动是在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总方针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策略、学运方针指引下进行的。1948年下半年，来自交大、复旦、暨南、同济、圣约翰、沪江、大同、光华、大夏等十几所大学和几十所男女中学及专科学校的一百多位上海学生党员和党员干部曾相聚在华中党校，大家在一起生活，共同学习总结，畅谈交流了上海地下学运经验。现在我根据当时的有关材料，具体谈谈有关党的策略原则在学生运动中运用的一些认识和体会。

利 用 合 法

对敌人的统治来说，一切革命斗争都是非法的，都是不允许的。利用合法是为了使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敌人所容许的合法开展活动。团结和争取广大中间群众更好与敌人进行斗争。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最艰苦的环境里，我们利用了班会、级会开展学术研究活动，开展班级之间的体育比赛和旧书交换活动，以团结群众。抗战胜利前夕，党通过统战工作，建议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爱国人士举办救济失学义卖市场，并联合申、新两报共同进行；还利用敌人想缓和与群众矛盾的机会，由上层人士在汪伪当局办了合法手续，公开登报，进行号召。党发动

了三十多所大中学校学生自制、捐献、向社会捐募义卖物品，推销代价券，筹建开办助学义卖市场，开展了群众性生活自救、助学义卖活动。仅两天，义卖市场顾客达十几万人，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赞誉。这次全市规模的校际社会活动，打破了当时在敌伪统治时期学运的沉闷空气，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希望，是党利用合法斗争的重大胜利。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我们利用了国民党报刊大肆宣传欢迎马歇尔到上海的时机，在马歇尔到达上海的12月20日下午，发动43所大中学校的四千多学生聚集在他住的华懋饭店附近的中央路广场“欢迎马歇尔”，推派代表向马递送“撤退驻华美军”、“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进行内战”、“调停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等六项要求，等候答复。马迟迟不见群众，国民党派出特务捣乱，殴打学生，群情激怒。同学们饿着肚子、冒着寒风整队出发，举行了争民主和和平的示威游行，沿路高呼“反对内战”，“反对美军驻华”等口号，把人民渴望和平的心声更响亮地喊了出来，戳穿了反动派勾结美帝准备内战的阴谋。

仅仅利用敌人的合法是不够的，还必须利用社会习惯所许可和群众公认的“合法”，有些活动敌人禁止、反对，公众认为合情合理，在群众发动起来和社会舆论同情支持的基础上，变成群众的口号和行动，无形中迫使敌人认为的“非法”为合法，也就是社会习惯、公众舆论、群众公认的合法。党曾指出要“争取我之合法，迫使敌人非法”，如历次不同形式生活自救的义卖助学运动和1948年底全市学生开展的社会救饥救寒运动，还有宣传爱用国货、抵制美货和1948年上半年全市学生反对“资本美国、工业日本、原料中国”、“美国老板、日本经理、中国奴隶”的“反美扶日”运动，反对美帝扶植日本，抢

救民族危机。这些活动都得到了社会各阶层和不少有名望的教授、学者、演员、律师、工商界上层代表人士的同情、赞助和支持。这些活动虽然不合敌人之法，敌人百般阻挠、禁止、破坏以至宣布为非法，进行镇压，但公众舆论，人民群众公认是善举，是好事，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爱国正义行动，为社会各阶层所拥护，敌人难以阻挡。有时还迫使敌人公开认可我们的某些活动为合法，如1946年的尊师助学运动，原是由党领导的上海学生团体联合会开展的群众性敬师助学运动，当时国民党不予承认，多方阻挠，破坏，都未得逞，继而又企图用官办替代，后经“学团联”通过政治上开明的著名教育家的疏通，促成谈判，改名为尊师运动，在确保运动的群众性和我们领导权的前提下，由“学团联”、教育局、学生总会联合举办，挂上与教育局联办的名义，致使国民党当局公开认可为合法，使“学团联”取得公开合法身份放手开展活动，“学团联”联系的学校，从98所扩大到159所，组织和发动了两万名学生上街劝募，使这次群众自救性尊师助学运动蓬勃地在全市范围内展开。

利用合法开展斗争，能使我们在敌人统治的环境里，更广泛地发动和教育群众，把广大中间、落后的群众吸引到活动中来，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联系，使斗争更为有利，使党的组织更好地隐蔽在群众之中，而敌人对于群众的这种活动和斗争也难以取缔和镇压。

为了更好地利用合法开展“非法”的革命斗争，党员必须具有公开的合法身份。党曾指出：“越公开越秘密”，实行党员社会化、职业化、群众化。党还要求党员都能贯彻“勤学、勤业、交朋友”的指示，这样就能使我们更好取得合法工作条件，得到老师爱戴、同学信任，提高了党员社会地位和威信，

使众多的学生党员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优秀生和同学的模范，使党的组织隐蔽扎根在群众之中。

扩大和利用敌人的矛盾

敌人的反动统治充满着各种矛盾，英美和日本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敌伪与国民党内部各种派系之间都存在着矛盾。

抗日战争前期，我们就利用英、法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英、法租界的存在，进行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开展了返乡、节约献金、募集寒衣运动，救济难民，支援抗日游击战争，不少学生参加了江南抗日义勇军或奔赴苏北、皖南。1943年日伪之间为了烟、赌、舞税收分赃不均，在报上宣传所谓“禁止烟赌舞运动”，并企图以此欺骗与缓和群众的不满。我们就利用这个矛盾和条件，把它扩大成为群众性的斗争，发动学生捣毁了上海南市地区的一些烟馆，当众烧了鸦片烟，将在烟馆抄出的准许营业的证书示众，说明这些烟馆的后台老板，又正是发起“禁止烟赌舞”的敌伪本身。通过这一斗争，揭露了敌人的卑鄙伎俩和丑恶面貌，教育了群众，扩大和加深了敌伪之间的矛盾。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展开了斗争，如利用CC系内部教育部长朱家骅与交大校长的矛盾，展开了反对合并交大系科摧残教育的斗争，发动交大全体同学乘火车去南京请愿。1948年初，英帝国主义强迫中国居民迁出九龙，造成流血惨案，国民党企图利用这一事件转移群众反美、反蒋的爱国民主运动的目标，我们就利用这个矛盾，于1月17日发动二万多学生，涌向英国领事馆，举行了抗议九龙事件的示威游行，提出了反对奴才卖国的外交政策、抢救民族危机，当游行队伍经过外滩美国海军指挥所时，高呼“抗议美军暴行”、“美国兵滚出去”，

用柏油在墙上、窗上书写一系列中英文反美暴行标语，画美帝暴行的漫画，原来在窗口看热闹的许多美国水兵狼狈地把头缩了进去。就这样将国民党的“反英”矛头转向反对美蒋的本身。

有时还要善于抓住敌人在每个大的运动和斗争中，往往存在的既想残酷镇压，又怕事态发展不可收拾的矛盾心理，适当变换斗争形式，促使敌人妥协让步，使斗争取得一定胜利，保持实力，鼓舞士气，准备新的斗争。如反对合并交大系科的斗争，交大二千多名师生员工集体赴南京请愿，铁路局不挂车，机械系学生自行开车，路轨破坏，土木系学生自己修，火车开到真如后，被大批军警包围，双方对峙，敌人内部极度恐慌混乱，朱家骅亲自飞赴上海，面对一场即将发生的镇压暴行，我们利用敌人害怕事态扩大的心理，积极谈判，迫使朱家骅签署了交大不改名，不停办任何院系，增加经费等五项保证，基本满足了学生要求，斗争赢得了胜利。

政治斗争与生活斗争相结合

政治斗争和生活斗争密切相联、不可分割，单纯的政治斗争不能持久，单纯的生活斗争不能提高深入，生活斗争使政治斗争有更广泛的基础，而政治斗争是生活斗争的集中和提高，二者相互配合运用。在长期的地下斗争中，我们比较注意循环交替发展生活性的政治斗争和政治性的生活斗争，使学生运动从广泛到提高，又从提高到广泛，使运动和斗争向纵深发展，团结教育群众打击敌人。1946年全市各界争和平反内战的“六·二三”运动之前，全市先后开展了群众性助学尊师运动，解决了近万名学生学费的困难。“六·二三”之后，利用暑假，又在校开展大量生活性的活动。1947年“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前，组织了各种此起彼伏的生活性政治斗争，